

·中国书史·

五代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

李致忠

五代是继唐代之后于十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五十三年时间里,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更迭;南方吴、吴越、前蜀、楚、闽、荆南(南平)、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十国并存。如果把后梁时期晋、齐、燕,后汉时期的清源,后周时期的武平,以及西北的定难等割据政权也计算在内,那就是十六国先后并立。这种混乱分裂、各占一方的局面,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而特殊的现象。它一方面造成了战火连年,民生凋敝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自独立、各行其政、各自都想保存自己,并吞旁人,妄图长治久安的历史奇剧。五代时期出现的很多现象,如南方诸王国经济上的相对繁荣,文学上的某些成就,以及雕版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等,表面看来都很奇怪,实际多是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

1.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著录五代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记载公元909—913五代前蜀雕印《道德经广圣义》

“《广圣义》之成,在唐天复元年,而其表上之则在蜀永平三年……是书,初任知玄刻之,起武成己巳,终永平癸酉之春,共成四百六十餘板。宋布衣道士王洞应再刻之于宋初,崇福观周观复三刻于嘉定甲申,此则从嘉定刻本所传钞。”

《广圣义》乃《道德经广圣义》之简称,凡三十卷,为唐末五代杜光庭所作。光庭字宾圣,自号东瀛子,唐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喜读经史,工词章、翰墨之学。唐懿宗设万言科选士,不中,遂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入蜀,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后隐居成都青城山白云溪。王建据蜀,赐号广成。其作《道德经广圣义》,是就唐明皇御注《道德经》及讲疏而加以疏义者。此书初刻者是五代时的任知玄,开版于蜀王建武成己巳(元年,909),藏事于永平癸酉(三年,913),前后历时四年。此为现知五代最早的刻书记录。

2.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郑准讥陈咏》记载五代初陈咏于蜀中自己雕印文集

“唐前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奕棋。昭宗劫迁，驻蹕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颖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卷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陈咏，生卒年不详，颖川盖是其字或号，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有诗名，以诗道自负。唐昭宗天复四年（904）登进士第，旋归蜀中。归蜀后尝自刻文集，并把“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刻于文集卷首。杜光庭见之讽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陈咏答曰这两句诗尝为朝贵们所见赏，所以“刻于卷首章”。杜光庭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到陈咏于天复四年（904）归蜀时已有55岁，尚称陈咏为“先辈”，因知陈应当年长于他，故可推知陈氏自刻文集，当不晚于五代之初，大大早于和凝自刻文集。

3.唐末五代徐夬《徐公钓矶文集》卷六《自咏十韵》诗载五代福建莆田地区刻印《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

“只合沧洲钓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

徐夬（生卒年不详），一作寅，字昭梦，莆田（今属福建）人。大约生当唐宣宗大中三年（849）至五代后梁贞明七年（921）之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曾途经大梁，作《游大梁赋》献朱全忠。后归闽，为闽王王审知辟为掌书记。夬工赋，其《斩蛇剑赋》、《御水沟赋》、《人生几何赋》尤为脍炙人口。其“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诗句中所指的“拙赋”，就指这几篇。意谓由于这几篇赋远近闻名，故偏处东南的莆田地区，竟把它们雕版印刷出来传卖；而诗意也被人们画成图画贴上屏风。可知这几篇脍炙人口的赋，早在他谢世前就版行于世了。足见福建于唐末五代时已有了雕版印刷事业。

4.唐释贯休《禅月集》昙域所撰《后序》记载后蜀乾德五年（923）雕印《禅月集》

“葬事既周，哀制斯毕，暇日或勋贤见访，或朝客相寻，或有念先师一篇两篇，或记三句五句，或未闲深旨，或不晓根源，众请昙域編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

贯休（832—912），字德隐，俗姓姜氏，婺州兰溪（今属浙江金华）人。七岁出家兰溪和安寺，二十岁受具足戒，移住婺州五洩山寺，修禅十年。唐懿宗咸通初开始游学。天复三年（903）入蜀，为前蜀王建所重，赐号“禅月大师”，为建龙华院居之。休十五、六岁即擅诗名，后广交诗友，与当代陈陶、方干、李频、许棠等多人皆有唱和。被誉为李白、白居易之后可嗣其美者。孙光宪《白莲集序》更称其诗“骨气混成，境意卓异”。昙域，今江苏扬州人，唐末五代时期的诗僧。

幼精六书,笔力雄健,为时所称。尝师从禅月大师贯休,贯休卒后,应众请,“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编成《禅月集》三十卷,于前蜀后主王衍乾德五年(923)雕版印刷成帙。《四库全书总目·禅月集》提要谓:“书籍刊本始于唐末,然皆传布古书,未有特刻专集者。晏域后序作于王建(误)乾德五年……则刊行专集自是集始,是亦可资考证也。”至南宋嘉熙四年(1240),婺州兰溪县兜率禅寺住持赐紫禅悟大师可灿又重刻此书,是为宋刻本。宋本曾为明末毛氏汲古阁所得,毛氏得后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命人影宋摹写,一是将其刻入唐三高僧诗。《四库全书》所录底本即毛氏汲古阁刻本,影宋抄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前蜀三》记载五代十国前蜀王衍咸康元年(925)雕印历日

“咸康元年六月,诏增闰十二月,历纸印造施行。初颁历无闰月,及是见唐历置闰,遂续补焉。”

古代通常都是在前一年冬至后,由司天台推算出来年新历,报礼部核准,印历所印制,礼部颁行。对于来年有无闰月,应当早已算好。五代政治社会混乱,正朔不一,因而出现历书已印发半年,才发现后唐历书置闰,故命增闰十二月,重新印造施行之事。唐代蜀中已有刻印历书传统,至五代沿行,此为实证。

6.五代后唐洛阳刻《弥勒下生经》

此经只剩残片,原出中国吐鲁番,后为德国人勒柯克所得,今藏日僧出口常顺处。卷尾镌“洛京朱家装印”、“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两行,表明此经为洛阳雕印历日的王家开雕,洛阳朱家印刷并进行装帧。还有墨书尾题二行:“从悔奉为亡妣特印此经一百卷,伏(以下残)往净方面礼弥陀(以下残)。”因知刻印此经也是有人发愿。荣新江《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文物天地》1997年5期)考证,此经是五代后唐时期洛阳刻印。后唐起于庄宗同光元年(923),迄于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可知此经之刻当在公元923—936年之间。

7.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石窟与密教》中记载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雕印《大随求陀罗尼经》

“1985年,在洛阳东郊史家湾砖厂出土了雕版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长0.38米,宽0.30米。中心画一面八臂大随求菩萨……环绕大随求菩萨之外是八圈梵文,再外是方形七周梵文。在圆形与方形梵文的四角绘出四身供养人。在方形梵文的四个方位,中心画一坐佛,左右各有二个种子字,以金刚杵间隔之。四角画天王。在此陀罗尼右侧印有文字云:‘经云,佛告大梵天王,此《随求陀罗尼》过去九十九亿诸佛共同宣说……岁在丙戌朱明之月初有八日报国寺僧知益发愿印施,布衣石弘广雕字。’其下墨书云:‘天成二年正月八日徐殷弟子依佛记’(按天成二年是五代后唐明宗年号,公元927年(丁亥),印刷的丙戌年即天成元年。)”

由此记载可知,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报国寺僧知益曾发愿印施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

8.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跋贞观政要》记载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国子监刻印《贞观政要》

“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

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初名洋,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高宗特为改今名。初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三十二年(1162)出知福州。累官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据此跋知《贞观政要》有婺州公使库刻本。然此本脱误颇多,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可知刘子驹出示其家五世珍藏的《贞观政要》,乃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所刻,因知五代国子监刻书不先始自经书,而是始于对统治者更具参考价值的《贞观政要》。此为现知中央官署中国子监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四部书籍的最早记载。

9.《宋史》卷四七九《列传》二三八《毋守素传》记载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雕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

“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龙门人。父昭裔,伪蜀宰相、太子太师致仕……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补三班奉职。”

史载,孟知祥镇西川时,使毋昭裔掌书记。明德元年(934)称帝,擢裔为御史中丞。明德二年孟昶嗣立,进昭裔为左仆射,即做了宰相。《十国春秋·毋昭裔传》谓“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宋代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毋公印书》亦谓:“毋公者,蒲津人也,侍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几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矣。’复雕《九经》诸书。”因知毋昭裔不但在宰相位上刻印了总集、类书,还主持刻印了《九经》。毋昭裔做后蜀宰相,在公元935年,其雕版印制上述诸书当在是年稍后。此为现知总集、类书最早的刻本。

10.宋薛居正等撰,清邵晋涵等辑《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书·高帝纪五》记载五代天福五年(940)张荐明雕印《道德经》

天福五年(940)五月,“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赐号‘通玄先生’。是时,帝

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张荐明，五代时燕人，少以儒学游河朔，后为道士，通老、庄之说。后晋高祖曾召见，善其言，延入内殿讲解《道德经》，拜以为师，并赐号。“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并命学士和凝另写新序冠于卷首，颁行天下，即在荐明讲解《道德经》获皇帝笃信后施行。可知五代后晋天福五年，即十世纪中叶，老子《道德经》已有了雕版印刷本行世。

11.五代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记载五代南唐升元六年(942)雕印《王公判事》

“王师范，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欧杀美人张氏，为其父诣州诉冤。师范为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为父，冀其可厚赂和解，免谕重叠。其父确然曰：‘骨肉至冤，唯在相公裁断尔。’曰：‘若必如是，即国法，予安敢乱之！’柴竟伏法，其母患之，然亦不敢少责。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焉。”

王师范(874—908)，唐末青州(今属山东)人。王敬武子。父卒时年仅十六，嗣为平卢节度使。为人喜儒学，谨孝道，执法无私。封建社会的地方官都要掌管刑狱，将折狱判牍加以整理，即可成书。这类书常被称为某公判牍或某公判事。王师范的判牍成书后即名《王公判事》。刘崇远，生卒年不详，自号金华子，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末，避黄巢之乱，渡江南徙，仕南唐李氏。《金华子杂编》自序称：“金华子者，河南刘生。少慕赤松子……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暨乎鬓发焦秃，而无所成名。凡为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辈。年逾壮室，方莅官于畿甸。继宰二邑，共换二十馀寒暑。唯知赳赳畏慎，不能磊落经济。罢秩归京，得留缀班……文林郎、大理司职刘崇远撰。”有人考证这篇序文写于南唐升元六年(942)。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记载王师范不徇私情，将其犯法的舅父问斩，很得当地百姓称道，故“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焉”。可知早在公元942年以前，山东青州一带这类判牍也有了版印记录。

12.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三《九经字样》著录五代后晋开运三年(946)雕印《九经字样》

“唐沔王友翰林待诏唐玄度撰。补张参之所不载，开成中上之。……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张参，唐河间(今属河北)人。玄宗开元中举明经。代宗大历初，为司封员外郎。大历十一年(776)，为国子司业。撰有《五经文字》三卷，收三千二百馀字，依偏旁为百六十部。唐玄度所撰《九经字样》，即为补张氏《五经文字》所不足。陈氏于故纸中所得者，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开运丙午，为五代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三年(946)，因知早在十世纪中叶，《九经字样》已有雕版印刷本行世。

13.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刻《大慈大悲



图一



图二

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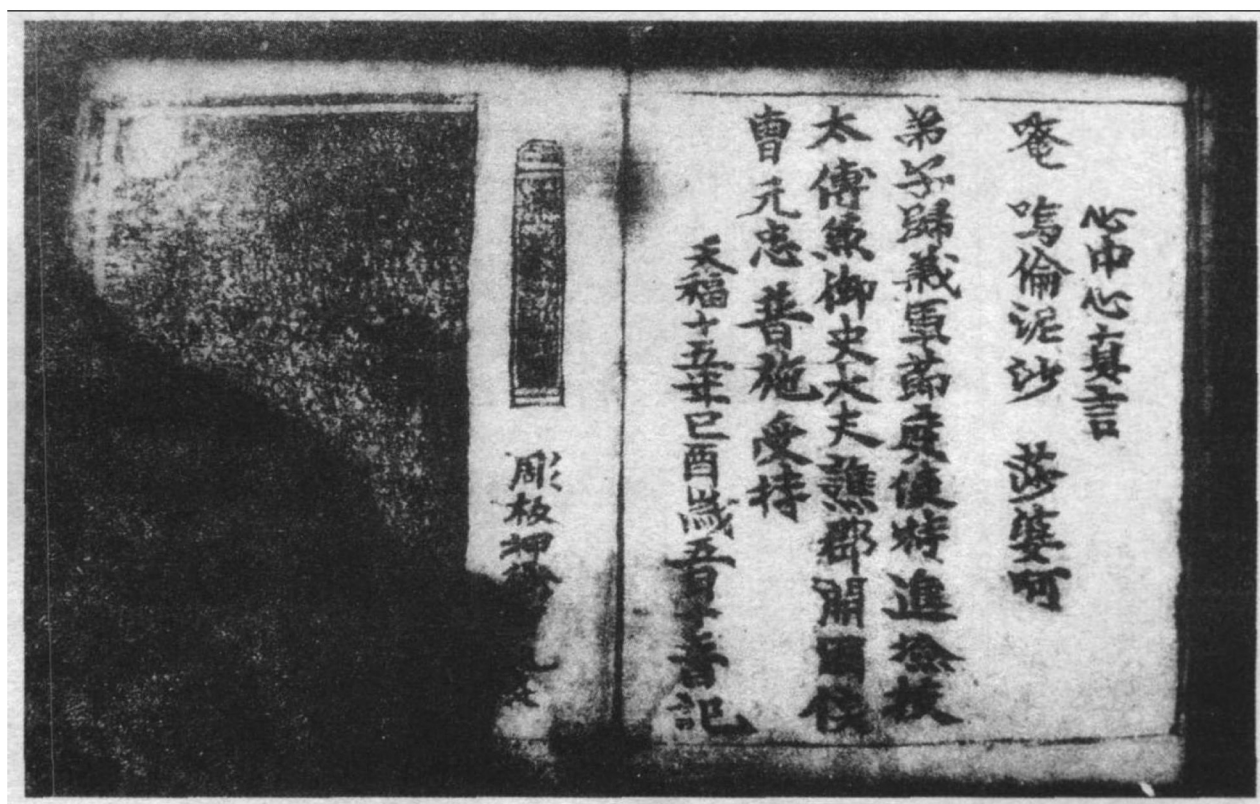
此单叶观世音菩萨像,印纸高32厘米,宽20.5厘米。版框高20.6厘米,宽13.7厘米。菩萨像及莲台高17.5厘米。麻纸印造。上半部版印观世音立像,像左右各铸一莲座立柱,右柱竖铸“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条记,左柱竖铸“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名。菩萨像系墨印彩绘。上部经幢、莲花、衣襟均为朱色,裤为白色,飘带为绿色。足下莲台为朱墨相间。构图简洁,人物突出,菩萨妙相慈祥,神态庄严。下半部铸发愿文:“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需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近美。”雕字匠人是雷近美。可知早在公元947年,西北边陲的瓜沙地区也有了雕版印刷技术。此图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

14.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图二)

此单叶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版框通高39厘米,宽26厘米。图像部分框高27厘米,文字部分框高12厘米。粗麻纸印造。上半部铸像,下半部铸文。沙门像部分,铸一位健壮的地神从地下露出半个身躯,用双手擎起毗沙门天王的双足。毗沙门天王挺然屹立正中,右

手执附旂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铁甲披肩,铠片鳞鳞。目光炯炯,蔑视一切。胡须上翘,无所畏惧。充分表现出毗沙门天王的强悍性格和无穷的威力。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婴儿,借以表现毗沙门天王随时变化婴儿普渡众生的故事。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线条刻划刚劲而不呆板,人物形像狰狞而不可恶。图像左上角,竖镌“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名。图像下面隔镌两道横线,横线下镌发愿文:“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与前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于同年同月同日镌雕。盖缘大圣毗沙门天王,是四大天王中的北门天,在唐代被奉为军神,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负有驻守瓜、沙等州军事安全之责,故雕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供养普施,以求保境安民;观世音菩萨自公元417年来化葱岭,治好河西王沮渠蒙逊病患之后,亦颇为东土僧俗所信奉,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同时又是地方行政长官,故雕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供养普施,以求合郡安康,俱霑福祐。此图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手稿部。

15.五代后晋天福十五年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曹元忠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图三)



图三

此件麻纸印造。册子装。全书通高 13.6 厘米,宽 10 厘米。版框高 12.2 厘米,宽 8.8 厘米。与现代 64 开图书开本相埒。卷尾镌“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三真言后镌“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

按,天福十五年,当是公元 950 年,但又明标“己酉岁”,己酉则是公元 949 年。这一年,曹元忠又雕印了《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此时名衔又加上了“御史大夫”。全经最后半叶残而不全,似有墨印粗黑版框痕迹。右上镌一圆柱,柱下镌“雕板押衙雷近美”字样。开运四年雕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时,雷近美还只是匠人,事过三年,虽然还雕字,但已为“雕板押衙”。可知曹元忠与雷近美身份地位都有变化。此经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

16.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国子监受命校刻《九经》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

长兴是五代后唐明宗所用年号,三年是公元 932 年。是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唐初,分置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省长官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讨论政务。永淳元年(682),裴炎任中书令,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张说任中书令,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设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科办理政务。可知中书门下,乃中书省的办事机构。由它起草奏章上报中书省请示皇帝用雕版印制《九经》,乃其职责所系。“依石经文字”和“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句中所谓之“石经”和“西京石经本”,指的是由郑覃撰写刻石立于长安的“开成石经”。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藏事于开成二年(837),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收《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凡十二经。另附《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凡二百二十七石。因知五代长兴三年国子监校刻《九经》所依据的底本是唐《开成石经》。此次校刻《九经》的目的,与自汉代刻立《熹平石经》以来的宗旨一样,依然是为天下人提供读经的范本。故敕令中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此为现知中央官署中国子监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儒家经典的最早记载。

17.宋薛居正等撰,清邵晋涵等辑《旧五代史》卷一〇一《隐帝纪》记载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国子监受命继续校刻《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汉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穀梁》

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

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距国子监受命开始校刻《九经》已有十六年,但尚有《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四经未行校勘,故由国子监提出奏请,要求集学官考校,雕造印行。得到批准施行。此为五代后汉国子监继续校刻《九经》的记载。

18.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载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国子监校刻《九经》藏事并进呈

“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

广顺三年(953),距此项工程之始已历二十二年,迭经四代,终告完成。不同的四个政治朝代,居然能在校刻《九经》问题上前赴后继,与冯道、田敏等居中坚持有关。冯道、田敏都不仅在一朝为官,虽然在人品上被讥为“常乐老”,然于校刻《九经》却坚持不懈,始终其事。到后周广顺三年六月,当《九经》和《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均已雕版印制完成时,田敏随同进书上了一道《进书表》,《表》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邈,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镂。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谨具陈进。”(《册府元龟·田敏进书表》)至此,五代国子监奉命校刻《九经》宣告毕工。

19.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载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校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本,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

显德二年是公元955年,这一年距国子监校刻《九经》藏事仅二年,解释经书音义的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提上了校刻的日程。尹拙(891—971),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五代后梁贞明五年(919)举三史。后晋天福四年(939)入右补阙。明年,转侍御史。会诏与张昭、吕琦等同修《唐史》。改仓部员外郎。后周显德初,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理院事,又与张昭同修《实录》,并与张昭、田敏同详定《经典释文》,镂版行世。入宋,改检校工部尚书。可知十世纪中叶,《经典释文》也已雕版印行。此为现知《经典释文》最早的刻本。

20.宋薛居正等撰,清邵晋涵等辑《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周书·列传》七《和凝传》记载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以前和凝自书上版并出资雕印自己的文集

“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新五代史》卷五六《和凝传》亦记载:“和凝……显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赠侍中。凝好饰车服,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卷,尝自

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

和凝(898—955),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人。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后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历礼、刑二部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院学士。明宗时迁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学士。后晋时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后汉时授太子太保。后周显德二年以背疽卒。显然,早在公元955年以前,已有自刻本文集行世。此为现知自己手书上版、自己出资雕印的最早的个人别集。

21.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吴越国王钱弘俶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图四)



图四

此经经文凡三百三十八行,每行八、九字不等,有边栏界行。卷首扉画前镌刻题记:“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篋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因知此经乃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钱弘俶所刻。显德三年,即公元956年,时间仍在五代。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曾在杭州西关建雷峰塔,供其宠妃黄氏理佛,并于塔的空心砖内各藏一卷此经,供养受持,以作功德。1925年雷峰塔倒塌,经卷散出,分藏各地。然此卷却于1917年改建湖州天宁寺时从石幢象鼻中发现。此经至北宋初年,仍在继续刻印。

22.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释《应之传》记载五代南唐保大十五年(957)以前中主李璟敕应之书《楞严经》雕版印行

“僧应之,姓王,其先南闽人。能文章,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初举进士,一黜于有司,投册骂曰:‘吾不能以区区章句取程于庸人’,遂为浮屠。保大中,授文章应制大德,赐紫……元宗喜《楞严经》,命左仆射冯延巳为序……敕应之书,镂版,既成上之,元宗叹曰:‘是深得公权之法者也。’”

保大,是五代南唐中主李璟的年号,起自943年,终于957年,行用十五年。元宗是李璟死后所上的庙号。其敕僧应之书写《楞严经》上版雕印,当在其身居王位之时,故有“是深得公权之法”的赞叹。可知《楞严经》在五代末期即

公元 957 年以前也有了雕版印刷本。

23. 五代归义军节度押衙杨洞芊刻《大圣普贤菩萨像》(图五)

此像亦为上图下文格局。上半为图,中镌普贤菩萨像,左右各镌一立在莲台之上圆柱,右柱镌雕“大圣普贤菩萨”,左柱镌雕“普劝众心供养”。像下镌雕十三行愿文:“弟子归义军节度押衙杨洞芊,敬发诚志,雕此真容。三十二相俱全,八十之仪显赫,伏愿三边无事,四众一家……。”因知此像乃杨洞芊所镌雕。

归义军,始建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义潮收复瓜、沙等州之后,直到北宋之初,历时一百多年,主要由张、曹两家所节度。前述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所雕《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都发生在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原因是曹元忠其时作归义军节度使才二年,故乞求神祇保境安民,刁斗藏音。此幅《普贤菩萨像》的构图格调及雕印水平,与曹氏所刻两像相埒。又有“归义军节度押衙杨洞芊……雕此真容”的证据,可知《普贤菩萨像》之雕印,当与曹氏雕印两像同时或稍晚一点。押衙,唐宋时特有的官名,职在管领仪仗侍卫。衙本作牙。军中对立两旗称牙旗,后世置牙门将,竖牙旗于门。掌典牙兵者,即称押牙。后牙改作为衙,故又有押衙之称。五代以前称古押衙,宋有左右押衙。此像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



图五

24. 五代刻本《大圣地藏菩萨像》

此像亦为上图下文格局。框高 42.7 厘米,宽 29 厘米。装帧成帧画状。四周镌印边栏,栏三线。上边为图,约占全幅三分之一,中镌大圣地藏菩萨像,像两旁于莲台上各镌一柱,右柱镌“大圣地藏菩萨”,左柱镌“普劝供养受持”。像下为双线横栏,栏下刊地藏略义。格调与曹元忠所刻《观世音菩萨像》及《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同而小异,向被鉴定为五代刻本。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

25. 五代刻本《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

此像亦为上图下文格局。印纸高 30 厘米,宽 19.8 厘米。版框高 26.5 厘米,宽 17 厘米,四周双边。上图框高 11 厘米,下文框高 15.5 厘米。图文之间隔镌墨线。上图中镌阿弥陀佛坐像,左右于莲台上各镌一柱,右柱镌“四十八愿阿弥陀



图六

佛”，左柱镌“普劝供养受持”。阿弥陀佛，亦称无量寿佛，其图像有显教、密教之分。密教阿弥陀佛又有胎、金之分，显教阿弥陀佛又有坐、立之分，然无论坐、立，皆为螺发之出家形。此印本阿弥陀佛是坐像，盖为显教之阿弥陀佛。下部文字为阿弥陀佛略义及诵念修持方法。其格调与前述《观世音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地藏菩萨像》大同而小异，向被鉴定为五代刻本。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

26. 五代刻本《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图六）

此图像原出中国敦煌莫高窟，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法兰西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等都有收藏。麻纸印造，上图下文格局。四周双边。上图中镌文殊师利菩萨像，左右各镌

一联牌，右牌镌“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左镌“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下镌三道细横线，横线下镌文殊师利菩萨略义及修持方法。与前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地藏菩萨像》、《普贤菩萨像》格调大同小异，但相较之下，《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印纸质地更细密，镌刻刀法更娴熟，历来被鉴定为五代时期的雕版印刷本。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